

《圣武亲征录》与近代西北史地学*

马晓林 艾骛德

内容摘要:乾嘉学者对《圣武亲征录》史料价值的关注,直接影响了近代西北史地学。晚清,何秋涛校本以稿抄本形式流传,李文田、沈曾植等皆辗转获得抄本并做了批注,复杂的传抄过程导致何秋涛校本的三种刊本内容各异。清末民初,缪荃孙藏抄本得到沈曾植、缪荃孙的重视,但一度流散,长期不为学界所知。沈曾植校本最具价值,可惜失传。傅增湘所藏《说郛》明抄本,揭开了研究的新篇章。王国维校注本重点利用《说郛》明抄本,但整体而言所用抄本未臻完备。日本、西方学者的《圣武亲征录》研究,受到西北史地学的直接影响。

关键词:《圣武亲征录》 稿抄本 元史文献 西北史地学

《圣武亲征录》是源出元朝宫廷的一部重要史书,主要记载元太祖成吉思汗、太宗窝阔台二朝征战史事,可与汉文史书《元史》、蒙古文史书《蒙古秘史》、波斯文史书《史集》相互印证发明,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。该书的整理本,以往学术界较为通行的是1926年王国维校注本^①。贾敬颜校本后出转精,1979年左右以油印本形式少量流传,2020年出版的新校本是陈晓伟整理的贾敬颜晚年修订稿^②。在西方学界,1951年出版的伯希和(Paul Pelliot)、韩百诗(Louis Hambis)《圣武亲征录》法语译注本第一卷(约当原书前四分之一的内容)^③,同样成为学术经典。

西北史地学,是19世纪兴起的史学潮流,以西北边疆史地与蒙元史为研

*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专项“13-14世纪欧洲文献中的蒙元史料译注与研究”(20VJXG009)的阶段性成果。

① 王国维:《蒙古史料四种》,清华学校研究院,1926年。

② 贾敬颜校注,陈晓伟整理:《圣武亲征录(新校本)》,中华书局,2020年。

③ Paul Pelliot and Louis Hambis, *Histoire des Campagnes de Gengis Khan: Cheng-wou ts' in-tcheng lou*, Leiden: E. J. Brill, 1951.

究重点,上承乾嘉史学,余绪持续至民国,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^①。《圣武亲征录》作为边疆史地和元史的重要文献,得到近代西北史地学者持续不断的关注。因该书流传过程复杂,校勘尤为繁难,所以一代代学者前赴后继地抄校、刊印,留下众多版本。韩百诗撰写的法语译注本前言(Introduction)、贾敬颜校本《缀言》、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罗依果(Igor de Rachewiltz)2004年的文章^②,都介绍和梳理了诸本流传和研究情况。但这些先行研究对版本的调查有不少遗漏,一些论断有失偏颇。前此我们已梳理过《说郛》中所存《圣武亲征录》的情况^③,本文则在全面考察海内外存佚的《圣武亲征录》稿抄本、刊本的基础上,重点梳理近代西北史地学者对此书的收藏、传抄、校注与刊刻,以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乾嘉以来中国史学的发展。

一、乾嘉时期的抄校

近代西北史地学的一大源头是乾嘉史学^④。要论近代学者对《圣武亲征录》的兴趣,也必须追溯乾嘉时期的情况。《圣武亲征录》一书,元明之际曾被陶宗仪收入类书《说郛》,而清乾嘉时期学者的《圣武亲征录》抄校研究,基本上与四库馆有关。

乾隆时期,四库馆得到了两种抄本。第一种抄本题《皇元圣武亲征记》,汪启淑(字慎仪,1728-1800)进呈^⑤。第二种抄本题《皇元圣武亲征录》,两淮盐政进呈^⑥。可惜四库馆臣未认识到此书价值,而认为“其书序述无法,词颇蹇拙,又译语讹异,往往失真,遂有不可尽解者”^⑦。因此《四库全书》不收,

①郭丽萍:《绝域与绝学:清代中叶西北史地学研究》,三联书店,2007年。章永俊:《鸦片战争前后中国边疆史地学思潮研究》,黄山出版社,2009年。Matthew W. Mosca, "The Literati Rewriting of China in the Qianlong-Jiaqing Transition," *Late Imperial China*, vol. 32, no. 2, 2011, pp. 89-132.

②Igor de Rachewiltz, "On the *Sheng-wu Ch'in-cheng lu*," *East Asian History* 28, 2004, pp. 35-44.

③艾骞德(Christopher P. Atwood)著,马晓林译:《〈说郛〉版本史:〈圣武亲征录〉版本谱系研究的初步成果》,《国际汉学研究通讯》第9期,北京大学出版社,2014年,第397-438页。

④胡逢祥等:《中国近现代史学思潮与流派(1840-1949)》,商务印书馆,2019年,第43-60页。Matthew W. Mosca, "The Literati Rewriting of China in the Qianlong-Jiaqing Transition," *Late Imperial China*, vol. 32, no. 2, 2011, pp. 89-132.

⑤参贾敬颜:《缀言》,《圣武亲征录(新校本)》,第3-4页。

⑥吴慰祖校订:《四库采进书目》,商务印书馆,1960年,第99页。

⑦永瑢编: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卷五二,商务印书馆,1933年,第1156页。

四库馆的两种抄本后皆亡佚,所幸乾嘉时期学者将它们抄出。

汪启淑进呈本,乾隆戊戌(1778)夏被赴京应试的闽侯人林茂春(字崇达)从四库馆抄出。侯官人郑杰(字昌英,号注韩居士,约1750-1800)以林茂春抄本为底本,对校友人黄时扬于苏州阊门所得的一种《说郛》抄本,作成稿本^①(下文简称“郑本”)。但后来学者对郑本罕有措意。郑本今藏国家图书馆(索书号:6109/614),铃翁斌孙(1860-1922)印、北京图书馆印,1950年代以后才被贾敬颜发现并利用。

两淮盐政进呈本,当即汪宪(字鱼亭,1721-1771)旧藏抄本的祖本。汪宪旧藏本(下文简称“汪本”),现藏南京图书馆(索书号:GJ/110226),今有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影印本^②。从汪本抄出的有钱大昕(字晓征,号辛楣、竹汀,1728-1804)抄本(下文简称“钱本”),现藏台湾汉学研究中心图书馆(索书号:02194)^③。钱大昕是最早认识到《圣武亲征录》与《元朝秘史》史学价值的学者之一^④。他曾论《圣武亲征录》云:“虽不如《秘史》之完善,而元初事迹亦可藉以考证。”^⑤钱本影响很大,被19世纪学者传抄,成为何秋涛校本的底本。

钱大昕可能还用过一种《说郛》抄本,即今国家图书馆藏清乾隆时人史梦蛟旧藏明抄本(索书号:A01507,下文简称“史本”)^⑥。此本铃有史梦蛟“借树山房”印、“国立北平图书馆所藏”印,有“晓征氏”丁巳年眉批^⑦,及借观款识。贾敬颜疑“晓征”即钱大昕^⑧,丁巳年为嘉庆二年(1798),而且认为

①郑杰:《原跋》,《圣武亲征录(新校本)》,第365页。

②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编: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史部第45册,齐鲁书社,1996年,第160-174页。

③“国立中央图书馆”特藏组编:《“国立中央图书馆”善本书目》卷一,“国立中央图书馆”,1986年,第176页。

④关于钱大昕的元史研究,参黄兆强:《清人元史学探究——清初至清中叶》,稻乡出版社,2000年,第73-206页。

⑤钱大昕:《十驾斋养新录》卷一三,《嘉定钱大昕全集》第7册,江苏古籍出版社,1997年,第357-358页。

⑥北京图书馆编:《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·子部》,书目文献出版社,1987年,第1695页。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委员会编: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·丛部》卷一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9年,叶三十八。

⑦眉批见于第1册《藏一话腴》“吴俗薄恶”条,第1册《艺圃折中》,第3册《教坊记》,第5册《白麝髓》(眉批2条),第11册《圣武亲征录》。前2条眉批有“晓征”,第1条有“丁巳”“吾吴”之语。

⑧贾敬颜:《缀言》,油印本,叶四。新校本删除了这个观点。

此本“为《说郛》中独放异彩之本”^①。但贾敬颜校本在择从异文时只有前三分之一较为重视史本,后面从史本者不多,他应该认识到了史本价值没那么高。但是《缀言》中的观点没有尽改。近代似乎没有学者见过史本。

翁方纲(字正三,号覃溪,1733-1818)藏有一部《圣武亲征录》抄本,今佚,其异文载于何秋涛(字愿船,1824-1862)校本。从这些异文来看,翁方纲藏本与汪本属于同一系统,校勘价值不高。

总之,乾嘉学者见到的抄本较为多样,主要包括三大系统:汪启淑进呈本、两淮盐政进呈本、史梦蛟藏《说郛》明抄本。但到了晚清,源出两淮盐政进呈本的钱大昕抄本几乎主宰了学术界。

二、晚清:何秋涛校本的稿抄本和刊本

19世纪西北史地学勃兴,在道咸之际成为显学,出现一批代表人物,如徐松、张穆、何秋涛^②,在经历同光前期的短暂沉寂后,又在李文田、沈曾植、洪钧等众多学者的积极参与下再度繁荣^③。在这一学术背景下,《圣武亲征录》何秋涛校本出现,并以稿抄和刊本形式传播,影响远及海外。

西北史地学开拓者徐松(字星伯,1781-1848)藏有一部《圣武亲征录》抄本(下文简称“徐本”),抄自钱大昕本,行间多有徐松注。徐松去世后,此本先后归湘潭袁芳瑛(1814-1859)、金溪熊子建、建德周暹(字叔弢,1891-1984),后者1952年捐赠给国家图书馆(索书号:8050)^④。1951年,韩百诗记载:“承北京图书馆馆长王重民先生美意,我有机缘考察近期从天津所得

①贾敬颜:《缀言》,《圣武亲征录(新校本)》,第7页。

②郭丽萍:《绝域与绝学:清代中叶西北史地学研究》,第103-117、150-162、179-193、262-263页。余大钧:《清代学者张穆及其对我国西北史地学的贡献》,《内蒙古大学学报(哲学社会科学版)》1984年第2期,第24-31页。张承宗:《张穆、何秋涛对边疆历史地理的研究》,《史学史研究》1983年第3期,第18-22页。Matthew W. Mosca, “The Literati Rewriting of China in the Qianlong-Jiaqing Transition,” *Late Imperial China*, vol. 32, no. 2, 2011, pp. 120-121.

③王川、谢国升:《李文田与晚清西北史地学研究》,《史学史研究》2015年第1期,第30-39页。胡逢祥:《沈曾植与晚清西北史地学》,《史学史研究》2014年第1期,第41-53页。贾建飞:《清代西北史地学研究》,新疆人民出版社,2010年,第40-175页。郭丽萍:《绝域与绝学:清代中叶西北史地学研究》,第277-291页。

④北京图书馆善本部:《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》卷二,中华书局,1959年,叶三十。北京图书馆编:《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·史部》,第335页。贾敬颜:《缀言》,《圣武亲征录(新校本)》,第8页。

之古抄本,可惜其对《圣武亲征录》而言并无新意。”^①尹磊认为,韩百诗所见的本子就是当时居天津的周叔弢藏的徐松抄本^②。然而,周叔弢藏书是1952年捐赠北京图书馆的。韩百诗1947-1950年任巴黎大学北平汉学研究所所长。王重民1948年底任北平图书馆代理馆长,1949年初,北平解放,王重民任北京图书馆副馆长,至1952年辞职。韩百诗考察这部抄本,很可能是在1948年底1949年初。韩百诗还说,这部抄本残缺,发现于“内阁”(Nei-ko),北京图书馆没有这部书,因而收藏^③。尹磊以为“内阁”是韩百诗误记。我们认为,这样奇怪的描述,恰恰说明此抄本可疑,甚至可能是解放前夕有人趁乱伪造古书牟利。总之,韩百诗所见到的不是徐本。

何秋涛校本之嚆矢,发于其师张穆。张穆(字石州,1805-1849)以徐本为底本,借得翁方纲家藏抄本为参校本,形成一部抄本(今佚)^④。何秋涛以张穆本为底本,并吸收了邵远平《元史类编》所引《圣武记》,参校《元史》^⑤。1849年,何秋涛校勘稿本完成,前有张穆序、吕贤基(字羲音,号鹤田,1803-1853)序及何秋涛自序。不过张穆用的二种抄本都是传抄已久的本子,而且二者非常接近,其中多数的阙文、讹误都是相同的。

何秋涛校本完成后,长期没有正式刊印,而是逐渐以抄本形式流传开来。在1859年之前,俄国学者巴拉第(P. I. Kafarov Palladius, 1817-1878)在北京得到一部何秋涛校本,据之撰成俄文译注本,1872年发表。诚如巴拉第所记,何秋涛是一位清贫的学者,没有资财刊刻此书^⑥。更加不幸的是,1862年何秋涛到保定担任莲池书院院长时,染疫去世,年仅三十九岁。黄彭年(1824-1891)作为何秋涛的友人,为之撰写《故莲池书院院长刑部员外郎何君墓表》,应该就在当时从何秋涛之子何芳棣处得到了何秋涛校本,由此北

①Paul Pelliot and Louis Hambis, *Histoire des Campagnes de Gengis Khan*, pp. XXIII-XIV. 原文为法语,笔者汉译。

②尹磊:《伯希和、韩百诗〈圣武亲征录译注〉译者的话》,《国际汉学研究通讯》第21期,北京大学出版社,2020年,第365-366页。

③Paul Pelliot and Louis Hambis, *Histoire des Campagnes de Gengis Khan*, p. XIV.

④何秋涛:《何斟圣武亲征录·序》,光绪二十年(1894)小沔巢刊本,叶一。

⑤何秋涛:《何斟圣武亲征录》,叶三、叶五、叶六、叶十五、叶二十二、叶二十四、叶二十六、叶八十九。叶三十一提到的“殿本”应该是指《元史》。

⑥Палладия, “Старинное китайское сказание о Чингиз-хане”, *Восточный сборник*, Том 1, СПб., 1872: 149-202. Igor de Rachewiltz, “On the Sheng-wu Ch'in-cheng lu,” *East Asian History* 28, 2004, p. 38. 陈开科:《巴拉第与晚清中俄关系》,上海书店出版社,2008年,第121-124页。

京士大夫颇得传抄^①。1864年,庄庚熙在北京张世准(字叔平,官至刑部主事)的书斋中见到一部何校本,遂抄录一部,并加了跋和注^②。庄庚熙抄本流传较广。李文田(字仲约,1834-1895)、沈曾植(字子培,1850-1922)各自获得的抄本,以及小沔巢刊本、《知服斋丛书》刊本,都源于庄庚熙抄本。李文田抄本得于光绪丁亥(1887),随后他在其上批注案语^③。今国家图书馆藏有一部吴兴刘氏嘉业堂旧藏抄本(索书号:5301),实际上抄自李文田批注本。

1890年代,何秋涛本有了三种刊本。第一种是光绪二十年甲午(1894)袁昶(字重黎,一字爽秋,1846-1900)在芜湖刊印的《何斟元圣武亲征录》,一般称为小沔巢刊本,又称浙西村舍汇刊本,皆以袁昶斋号命名。这是《圣武亲征录》最早的刊本。1887-1890年间,洪钧(字陶士,号文卿,1839-1893)出使西方,请袁昶搜集抄录资料寄到俄国,其中就包括何秋涛校本及李文田、沈曾植等人的校注^④。今湖南图书馆藏有清袁昶蓝格抄本何秋涛《校正元亲征录》一卷二册,有洪钧批校、浙西村人题识,当即袁昶抄寄给洪钧的本子。袁昶所刊版本收录李文田、沈曾植、文廷式(字道希,1856-1904)及缪荃孙(1844-1919)校注案语,但常常不标识各人姓名^⑤。此本较为通行,传播很广,重印本有明治三十四年(1901)东京文求堂刊本、1934年长沙商务印书馆版、1970年台湾艺文版、1985年北京中国书店影印本,等等。

第二种是广东顺德人龙凤镡(字伯鸾,1867-1909)作为《知服斋丛书》第三辑第十五种刊印的,题《校正元圣武亲征录》,署“光泽何秋涛愿船校正,顺德李文田仲约、嘉兴沈曾植子培校注”。刊印时间当在李文田跋的光绪十九年(1893)和龙凤镡作《知服斋丛书序》的光绪二十二年(1896)之间^⑥。沈曾植在《圣武亲征录》校注上用力颇深。李文田称赞沈校本精细远出张穆、何

①姚士达:《校正元圣武亲征录跋》,《圣武亲征录(新校本)》,375页。

②庄庚熙注,见何秋涛:《何斟圣武亲征录》,叶四十一、叶六十三、叶七十三、叶七十九。

③李文田:《校正元圣武亲征录跋》,影印《知服斋丛书》本,《广州大典》第12辑,广州出版社,2008年,第558页。

④钱仲联:《沈曾植海日楼文钞佚跋(一)》,《文献》1991年第3期,第176页。沈曾植:《圣武亲征录校本跋》,许全胜、柳岳梅整理:《海日楼书目题跋五种》,中华书局,2017年,第146页。

⑤王国维:《〈圣武亲征录校注〉序》,《蒙古史料四种》,叶一。

⑥龙凤镡:《知服斋丛书序》,《广州大典》第12辑,第2页。许全胜将《圣武亲征录》刊刻时间系于光绪二十二年(许全胜:《沈曾植史地著作辑考》,中华书局,2019年,第9页)。

秋涛之上。龙凤镗到北京求得沈曾植校本^①,也得到了李文田的校注^②,回乡后刊刻。《知服斋丛书》本文字比小沔巢本准确,大概得益于利用了沈曾植校本,避免了很多文字脱漏和舛讹。《知服斋丛书》本收录的校注每条都标明作者,条文比小沔巢本多,绝大多数都是李文田、沈曾植的贡献,其中沈曾植的校注最多。今有《广州大典》2008年影印本。

第三种是光绪二十三年(1897)保定莲池书院(莲池书局)刊印的,题《校正元亲征录》,刊印者是何秋涛之子何幼愿,所据底本当为何秋涛定稿,所以此刊本文字较准确,但仅收何秋涛注。赵万里说,莲池书院本刊于小沔巢本之前^③。此说流传颇广,但不准确。国家图书馆藏本(索书号:69288)卷首有“光绪廿三年三月莲池书局刊”牌记。孙殿起(1894-1958)正确地著录为光绪二十三年三月莲池书局刊本^④。今人有著录为光绪三十三年者^⑤，“三十三年”当为“二十三”之讹。贾敬颜在《缀言》中介绍何秋涛校本的刊本时,有云:“通行者,乃光绪三十五年袁昶小沔区巢刻本,先一年尚有莲池书院刻本。”^⑥“小沔区巢”,为“小沔巢”之讹。光绪至三十四年而终,“光绪三十五年”显误。实际上,小沔巢本刊于光绪二十年,而莲池书院本刊于光绪二十三年。

何秋涛校本的三种刊本,以莲池书院本最接近何秋涛定稿,而小沔巢本、《知服斋丛书》本都出自后来学者抄录、增注的本子。小沔巢刊本脱漏了己卯(1219)年一句、戊戌至辛丑(1238-1241)年的五行文字,还有其他舛讹,应该都是其底本庄庚熙抄本的问题。这些文字,在《知服斋丛书》本中没有脱漏。《知服斋丛书》本的底本应该是在庄庚熙抄本基础上的一种校本,很可能就是沈曾植校本。小沔巢刊本、《知服斋丛书》刊本皆收录了何秋涛以后学者的校注案语。小沔巢刊本中标识庄庚熙3条、缪荃孙1条、沈曾植2条、李文田1条、文廷式1条^⑦,但多数不标作者。王国维征引时只好笼统

①嘉兴博物馆编:《函绵尺素:嘉兴博物馆藏文物·沈曾植往来信札》,中华书局,2012年,第58页。

②李文田:《校正元圣武亲征录跋》,《广州大典》第12辑,第558页。

③赵万里:《静安先生遗著选跋》,吴泽主编,袁英光选编:《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》,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1983年,第297页。

④孙殿起:《贩书偶记续编》卷五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0年,第46页。

⑤河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:《河北省志》第83卷《出版志》,河北人民出版社,1996年,第270页。

⑥贾敬颜:《缀言》,《圣武亲征录(新校本)》,第8页。

⑦何秋涛:《何斟圣武亲征录》,叶四十一、叶六十三、叶七十四、叶七十九、叶八十三、叶九十一;《勘误》,叶四。

地称“某氏云”^①。而《知服斋丛书》本逐一标出校注者之名。以《知服斋丛书》本比对可知,小泓巢刊本未标作者的校注案语,绝大多数是沈曾植的贡献。据笔者统计,小泓巢刊本中的校注条文仅有6条不见于《知服斋丛书》本^②,而《知服斋丛书》本收录校注条文较小泓巢刊本多出150余条,多数是李文田、沈曾植注,还收录了朱一新(1846-1894)、龙凤鏤案语各1条^③。即使是小泓巢刊本已收的条文,《知服斋丛书》本所收文字也更完整。

何秋涛校本影响力的扩大,洪钧功不可没。洪钧撰著《元史译文证补》时,著有《〈圣武亲征录〉注》^④,但此书在他1893年卒后不传于世^⑤。洪钧的主要贡献之一是获得了贝勒津(Илья Николаевич Березин, 1818-1896)《史集》俄译本^⑥。《史集》是波斯拉施特编纂的史书,与《元史》《圣武亲征录》同出一源,具有极高参考价值。1897年,洪钧遗著《元史译文证补》出版^⑦,其中大量利用《史集》,也征引何秋涛校本及诸家注,引起中外学者的进一步关注^⑧。

日本学者内藤湖南(1866-1934)于1899年到访中国时,获得一部小泓巢刊何秋涛校本。书商田中庆太郎(1880-1951)于1900年到中国,也得到了的一部小泓巢刊本^⑨,次年在东京文求堂排印翻刻^⑩。1900年,那珂通世(1851-

①王国维:《圣武亲征录校注》,《蒙古史料四种》,叶八十六。

②何秋涛:《何斟圣武亲征录》,叶八、叶四十七、叶七十三、叶八十六、叶九十、叶九十九。

③何秋涛校正,李文田、沈曾植校注:《校正元圣武亲征录》,《广州大典》第12辑,第509、555页。

④《洪钧致薛福成札五通》,《东南文化》1986年第2期,第157-158页。

⑤王国维:《〈圣武亲征录校注〉序》,《蒙古史料四种》,叶一。

⑥Илья Николаевич Березин, *Сборник летописей. История Монголов, сочинение Рашид-едина*, С.-Петербург, 1858-1888.

⑦陆润庠:《〈元史译文证补〉序》,洪钧:《元史译文证补》,光绪二十三年(1897)刻本,叶一至二。参周清澍:《洪钧与〈元史译文证补〉》,《周清澍文集》下册,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2020年,第224页。光绪二十三年(1897)刻本有缺卷,另一种更为完整的稿本为沈曾植所藏,现藏上海图书馆(索书号:线善755885-86)。参马明达、李峻杰:《洪钧史迹述略》,《暨南史学》第8辑,2013年,第369-370页。

⑧郭丽萍:《绝域与绝学:清代中叶西北史地学研究》,第284-291页。黄兆强:《清人元史学探研》,第14-17页。

⑨内藤湖南:《皇元聖武親征錄の翻刻》,《史学雜誌》第11编第8号,1900年,第123-124页。内藤湖南等著:钱婉约译:《中国访书记》,九州出版社,2020年,第77-78页。

⑩何秋涛:《元圣武亲征录》,文求堂,1901年。

1908)在两湖书院助教陈毅(字士可,1873-?)的帮助下^①,获赠梁鼎芬(号节庵,1859-1919)藏小沔巢刊本、《知服斋丛书》刊本各一部,以及陈毅藏抄本的副本^②。陈毅藏抄本,系姜渭(字璜溪,1832-1869)同治甲子(1864)得于淮南,在陈毅之后归王廷采、贾敬颜^③。陈毅藏抄本与何秋涛本差异很小,显然同出一源,因此那珂通世没有用它。那珂通世在小沔巢本上做了批点^④,但最终选择以内容更完备的《知服斋丛书》本为底本校正增注,约1902年完稿,但没有立即出版。1907年出版的《元朝秘史》日文译本《成吉思汗实录》的注释中有所征引,全稿《校正增注元亲征录》收入1915年出版的《那珂通世遗书》^⑤。

何秋涛校本刊刻后,在清末民国的学术界影响很大。屠寄(1856-1921)《蒙兀儿史记》、柯劭忞(1850-1933)《新元史》、丁谦(1843-1919)《元圣武亲征录地理考证》(浙江图书馆刊本,1915年),使用的都是小沔巢刊本。王国维使用了小沔巢刊本以及东京文求堂重刊的小沔巢本。王国维旧藏的这二种刊本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(索书号:A02232、A02229),其上分别有王国维据傅增湘本、陶湘涉园本所作的批校^⑥。贾敬颜使用了莲池书院刊本、袁昶小沔巢刊本。而内容最完备的《知服斋丛书》本,却因为传世稀少,未被中国学者利用。

三、清末民初:沈曾植校本与缪荃孙抄本

沈曾植,在西北史地学的发展上具有上承清学、下开新域的意义^⑦。沈曾植的研究视野广阔,常常突破以往学者的局限,联结起了新时代的学术。何秋涛校本,成为清末学者争相研读的对象,但其底本不佳始终是一大缺憾。仅沈曾植、缪荃孙等少数学者见到过一种质量更佳的抄本。缪荃孙

①中见立夫:《「元朝秘史」渡来のころ——日本における「东洋史学」の开始とヨーロッパ东洋学、清朝「边疆史地学」との交差》,《东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》别册4,2009年,第3-26页。

②《清人陳毅氏より那珂通世氏にあてたる書状》,《史学雑誌》第11编8号,1900年,第121-122页。

③贾敬颜:《缀言》,《圣武亲征录(新校本)》,第3、7页。

④那珂通世批点过的小沔巢刊本,钤“故教授文学博士那珂通世遗书”“那珂”印,今藏日本筑波大学附属图书馆(请求记号:ヨ636-15)。

⑤那珂通世:《成吉思汗实录》,大日本图书株式会社,1907年。那珂通世:《校正增注元亲征录》,《那珂通世遗书》,大日本图书株式会社,1915年,第1-149页。

⑥贾敬颜:《缀言》,《圣武亲征录(新校本)》,第8页。

⑦胡逢祥:《沈曾植与晚清西北史地学》,《史学史研究》2014年第1期,第41-53页。

(1844-1919)广义上可以算作西北史地学的一分子,因为其父缪焕章与徐松交往甚厚,其本人也与西北史地学者交游密切^①。缪荃孙藏有一种《皇元圣武亲征记》抄本(下文简称“缪本”),得自嘉兴钱仪吉(字心梧,1783-1850)^②,文本与源出四库馆汪启淑进呈本的郑本很接近。缪本的价值应该是沈曾植最早发现的。

沈曾植于《圣武亲征录》用力甚勤,一生中先后有两种校本,都用到缪本。沈曾植最初得到一部辗转抄自何秋涛本的抄本,以之为底本进行校注。1888年,他借校缪本^③。1894年,袁昶将抄录的沈曾植眉端校语刊入小沔巢本。同一时期,龙凤鑣刊刻的《知服斋丛书》本,依据的应该是沈曾植批校的抄本。1900年,沈曾植北京宅邸中的藏书毁于庚子之乱,其中包括沈曾植批校本《圣武亲征录》。1917年丁巳冬,沈曾植重新开始校注工作。起因是他从书商处得到明抄本《说郛》,取其中的《圣武亲征录》与刻本校,异文很多^④。王遽常(1900-1989)认为“丁巳校本已刻入《知服斋丛书》”^⑤,钱仲联、戴家妙、许全胜与柳岳梅皆从之^⑥。实则丁巳年是1917年,晚于《知服斋丛书》本,沈曾植是因得到明抄本《说郛》而重新开始校勘《圣武亲征录》的。据王国维亲见亲闻,沈曾植所用底本是小沔巢刊本,借傅增湘藏明抄本手校于其上^⑦。沈曾植1918年9月15日第二次借来缪荃孙藏《皇元圣武亲征记》,显然仍致力于此事。同年11月,王国维记载,他拜访沈曾植时,沈曾植“又言其所校注《蛮书》、《黑鞑事略》、《圣武亲征录》等共约十种,均有标识,而未详引书籍,欲写定之,须一岁之力,拟努力为之。然恐无此事耳”^⑧。可见沈曾植的《圣武亲征录》校勘已经初步完成,未来计划详引书籍而写定。“然恐无此事耳”之语,是王国维的担忧。沈曾植在《序元圣武亲征录校本》

①参杨洪升:《缪荃孙研究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8年,第23-66页。

②缪荃孙:《艺风藏书记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9年,第321-322页。

③缪荃孙:《缪荃孙全集·日记》第1册,凤凰出版社,2014年,第30页。

④许全胜、柳岳梅整理:《海日楼书目题跋五种》,第146页。

⑤王遽常:《清末沈寐叟曾植先生年谱》,台湾商务印书馆,1982年,第86页。

⑥钱仲联:《沈曾植海日楼文钞佚跋(一)》,《文献》1991年第3期,第176页。戴家妙:《〈寐叟题跋〉研究》,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,2015年,第20页。许全胜、柳岳梅整理:《海日楼书目题跋五种》,第147页。

⑦王国维:《校正元圣武亲征录一卷》,《圣武亲征录(新校本)》,第389页。

⑧王国维:《致罗振玉》,房鑫亮编:《王国维书信日记》,浙江教育出版社,2015年,第371页。

一文中回忆,庚子年(1900)自己旧藏抄本被毁,随后称“于今二十年矣”^①。因此可知,沈曾植作序约在1920年,《圣武亲征录校本》已经完稿。但沈曾植校本未见刊刻,今不可得见。2006年,中国嘉德国际拍卖公司拍出一部写本《圣武亲征录》,钤有沈曾植“乙庵”印,据说满篇朱笔批校,有沈曾植前跋^②。虽然我们只能见到一页抄录“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”的钤印书影,但可以推断应与沈曾植1900年或1917-1920年间的校本有关。

约1899-1900年,王懿荣(字廉生,1845-1900)在北京筹刻《圣武亲征录》《元朝秘史》等书。根据王懿荣与缪荃孙的通信可知,王懿荣从缪荃孙处得到“《亲征录》原函及赐钞本”^③。“原函”应即何秋涛校本,“赐钞本”很可能是缪本。王懿荣与缪荃孙交流时,认为何秋涛校本“恐不足凭”^④。令人遗憾的是,1900年,八国联军侵入北京,王懿荣自杀殉国,刻书计划未及实现。

缪荃孙本人的校勘工作,集中于1917-1918年。据《缪荃孙日记》记载,1917年11月10日(丁巳年九月二十六日),缪荃孙借来傅增湘藏《大元圣武亲征录》^⑤(即下节所言傅本)。1918年2月至3月(戊午年正月),缪荃孙用傅本校完缪本,将傅本归还^⑥。闰七月、八月,缪荃孙将自己所藏的《圣武亲征记》(缪本)借给沈曾植,并且两度造访沈曾植交谈^⑦,很可能是对此书的版本有了新的认识。八月下旬,缪荃孙从商务印书馆借来“明钞《说郛》廿七本”^⑧,当即张元济涵芬楼藏明抄残本二十九册(下文简称“张本”),现藏国家图书馆(索书号:7557)^⑨,《日记》中的“廿七”当为“廿九”之误。到九月初,缪荃孙继续校《圣武亲征录》十馀叶^⑩。翌年,缪荃孙去世,藏书四散,他的《圣武亲征录》校勘工作也不为世人所知。

①钱仲联:《沈曾植海日楼文钞佚序(中)》,《文献》1990年第4期,第199页。

②翁连溪、袁理:《古籍春秋——中国古籍善本鉴赏与收藏》,新世界出版社,2009年,第100页。

③钱伯城、郭群一整理:《艺风堂友朋书札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,2018年,第170页。

④钱伯城、郭群一整理:《艺风堂友朋书札》,第175-177页。参《缪荃孙全集·日记》第4册,第38、40、51页。

⑤缪荃孙:《缪荃孙全集·日记》第4册,第43页。

⑥缪荃孙:《缪荃孙全集·日记》第4册,第64、77、78页。

⑦缪荃孙:《缪荃孙全集·日记》第4册,第157、158、162页。

⑧缪荃孙:《缪荃孙全集·日记》第4册,第162页。

⑨《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》卷五,叶三十六至三十七。《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·子部》,第1694页。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·丛部》卷一,叶三十八。

⑩缪荃孙:《缪荃孙全集·日记》第4册,第162-164页。

缪本现藏浙江图书馆(索书号:善 1167),册中夹有“浙江省立图书馆一九五九年十二月第 74 号史部杂史类《元圣武亲征记》”签条,可能是入藏时间。缪本首页题《皇元圣武亲征记》,封面无字,与萧洵《故宫遗录》合为一册。卷前衬叶钤“缪荃孙臧”印,卷首钤“艺风堂藏书”印、“浙江省立图书馆藏书印”。缪荃孙《艺风藏书续记》载,《皇元圣武亲征记》一卷、《黑鞑事略》一卷、《承华事略》一卷、《故宫遗录》一卷,四种为一册^①。但现今浙江图书馆所藏变成了二册,即《皇元圣武亲征记》与《故宫遗录》为一册,《黑鞑事略》与《承华事略》为一册(索书号:善 1166)。缪本中的朱笔批校,当出自缪荃孙之手。我们逐一检核朱笔批校,与其他抄本对勘,可推知其出处。在缪荃孙的朱笔批校中,应该有 15 处来自傅本,有 26 处来自何秋涛本的正文或何秋涛案语,还有 13 处既可能来自傅本也可能来自何秋涛本;另有 5 处出处不详,可能是理校。这与缪荃孙的校勘工作是相符的。

总之,缪本在 1917 年终于得到沈曾植、缪荃孙的真正重视,可惜不久二人先后离世,沈曾植校本、缪本皆流散。因世事变迁,缪本隐而不显。1980 年代,缪本被贾敬颜重新发现,但贾敬颜的《圣武亲征录(新校本)》2020 年才出版。可以说,在沈曾植、缪荃孙身后近一百年的时间里,除了贾敬颜之外,缪本应该一直无人问津。沈曾植的《圣武亲征录》研究应该超拔于时,但他前后两次校本都未能流传于世。

四、1917 年以降:《说郛》明抄本的利用

清末西北史地学,对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,当然也影响藏书家、文献学家。王国维(1877-1927)直承西北史地学之绪绪,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沈曾植晚年的学术^②。关于王国维对西北史地学遗产的具体继承情况,《圣武亲征录》是一个鲜明的例子。

1917 年以前,对于《圣武亲征录》,除沈曾植、缪荃孙外,学者因所见抄本有限,能做的工作只是利用《元史》《元朝秘史》《史集》等文献进行校注,苦于无善本可资校勘。

1917 年,一种明抄本出现了,即傅增湘(号沅叔,1872-1949)藏《说郛》(下文简称“傅本”),现藏上海图书馆(索书号:786660-786719)。这一年,傅增湘用朱笔批注傅本异文于小沅巢刊本之上。傅增湘朱笔批校本应该不

^①缪荃孙:《艺风藏书记》,第 321-322 页。

^②钟兴麒:《王国维与西北史地学》,《新疆社会科学》1985 第 6 期,第 72-79 页。彭玉平:《论王国维与沈曾植之学缘》,《中山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》2010 第 2 期,第 53-69 页。

止一部,传入日本的就有两部。一部赠予内藤湖南^①,1952年入藏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研究所内藤文库(索书号:东方-史-IV-1)^②。另一部为羽田亨(1882-1955)所得,1986年尚在其子羽田明(1910-1989)京都家中,那年春罗依果到访京都时获赠缩微胶卷^③。1920年,羽田亨抄录此本赠予伯希和,1951年韩百诗误以为这是羽田亨自己批校的^④,2004年罗依果指出这是傅增湘的批校^⑤。伯希和的校勘记偶尔与傅本不符,因为转经傅增湘、羽田亨二手。丁巳(1917)九月二十日傅增湘在正文末页朱笔手书跋语:“据此本(引者按:即傅本)校勘增改删乙凡七百馀字,远出翁、张、何、李所得之外,异日当就柯凤孙前辈考证刊行,为此书增善本也。”柯劭忞(字凤孙)未能如傅增湘所愿用傅本考证刊行《圣武亲征录》,而沈曾植、缪荃孙立即开始研究傅本。前文已述,沈曾植以傅本、缪本校何秋涛本,缪荃孙用傅本校缪本。可惜缪荃孙批校本、沈曾植校本未能在学界流传。

王国维虽然没见过沈曾植校本、缪荃孙批校本,但他与柯劭忞、沈曾植交往时已得知傅本的价值。在沈曾植、缪荃孙相继去世后不久,1925年,王国维开始了校注工作。他以何秋涛校本为底本,校以三种抄本。(一)傅本,1925年冬,王国维向傅增湘借得,批校在小沔巢刊本上。这部王国维批校本,现藏国家图书馆(索书号:02232),有《续修四库全书》影印本^⑥。(二)万历抄本《说郛》,系银行家、收藏家陶湘(字兰泉,号涉园,1870-1940)藏书(下文简称“陶本”),今不知所踪。1926年2月王国维到天津,对校陶本与傅本,发现二本“略同”,因此笼统称为“诸《说郛》本”,只是偶尔标出二者异文^⑦。(三)江南图书馆(今南京图书馆)藏汪宪旧藏《圣武亲征录》抄本(汪本)。王国维雇人影抄汪本,对校后,发现它与何秋涛本的底本“同出一源,

①内藤湖南著,马彪译:《中国史学史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7年,第317页。

②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编:《附注内藤文库目录》,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,1953年,第4页。

③Igor de Rachewiltz, “On the Sheng-wu Ch’ in-cheng lu,” *East Asian History* 28, 2004, p. 39.

④Paul Pelliot and Louis Hambis, *Histoire des Campagnes de Gengis Khan*, p. xxiii.

⑤Igor de Rachewiltz, “On the Sheng-wu Ch’ in-cheng lu,” *East Asian History* 28, 2004, p. 39.

⑥何秋涛校,王国维批注:《校正元圣武亲征录》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423册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2年,第542-768页。

⑦王国维:《圣武亲征录校注》,《蒙古史料四种》,叶六至七、叶十四。

而字句较胜,夺误亦较少”^①。实际上,何秋涛本的底本就出自汪本。由汪本到钱本,再到徐本,再到何秋涛本,是递相传承的。

王国维 1926 年出版的《圣武亲征录校注》,因为利用了上述三种新抄本,而且参考了洪钧《元史译文证补》所引贝勒津俄译本《史集》,所以比何秋涛校本有很大进步^②。不过,王国维校注本不无遗憾。首先,底本有缺憾。王国维所用何秋涛校本是小泓巢刊本,而未见到更好的刊本《知服斋丛书》本、那珂通世增订校注本。而沈曾植校本、缪本的流散,导致王国维遗漏了一个独立的抄本系统。其次,王国维过于遵从底本,刊本中能根据傅本、陶本校正的 50 余处舛讹一仍其旧。再次,《史集》也是一种传抄过程复杂的文献,贝勒津在其译本中勇敢地运用自己的突厥语、蒙古语知识校改疑难专名,但称不上是科学的校勘。用舛讹众多的《史集》校订舛讹众多的《圣武亲征录》,正如借听于聋,求道于盲。例如人名“诺塔”,何秋涛本讹作“塔塔”,王国维据贝勒津本《史集》Tūqteh 从何秋涛本^③,但实际上 Tūqteh 是波斯文 Nūqteh 之讹。最后,正如伯希和指出的,王国维未能利用《黄金史》《蒙古源流》等蒙古文献^④。

1927 年,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张宗祥(1882-1965)编校的百卷本《说郛》^⑤。张宗祥使用四种百卷本《说郛》残抄本补配合校,认为自己复原了洪武年间(1368-1399)陶宗仪编纂的《说郛》百卷原本。但是渡边幸三、景培元皆已指出,《说郛》中收有永乐年间(1403-1424)的作品^⑥。实际上,张宗祥使用的所有抄本都是 1450 年以后的本子,其中都有《说郛》在陶宗仪卒后增编的文本。

在张宗祥所用的四种《说郛》本中,三种含《圣武亲征录》,但他仅用两种

①王国维:《〈圣武亲征录校注〉序》,《蒙古史料四种》,叶一。

②Paul Pelliot and Louis Hambis, *Histoire des Campagnes de Gengis Khan*, p. xxiii.

③王国维:《圣武亲征录校注》,《蒙古史料四种》,叶四十二、叶五十五。

④Paul Pelliot, “L’édition collective des œuvres de Wang Kouo-wei,” *T’oung Pao* 26 (1928), pp. 113-182. 伯希和:《评王国维遗书》,冯承钧编译:《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》第 1 卷第 5 编,商务印书馆,1962 年,第 57-60 页。

⑤陶宗仪:《说郛》,上海,商务印书馆,1927 年。重印本有 1972 年台北商务印书馆本、1988 年《说郛三种》(前二册)。昌彼得制作了索引。昌彼得:《说郛考》,文史哲出版社,1979 年,第 43-405、483-506 页。

⑥渡边幸三:《说郛考》,《东方学报》(京都)第 9 册,1938 年,第 230 页。King P’ei-yuan (景培元), *Études comparative des diverses éditions du Chouo fou*, Beiping: Centre Franco-Chinois d’Études Sinologiques, 1946, pp. 3-4.

抄本进行折中糅合。因为他入手孙诒让旧藏本(下文简称“孙本”,现藏浙江省瑞安市玉海楼博物馆)较晚,未用于校勘《圣武亲征录》。张宗祥用的这两种抄本,此前未被学者使用。第一种抄本,贾敬颜因其写于“京师图书馆钞”书纸上而称之为“京本”,实际上这种本子是傅本的复抄本(下文简称“傅京本”)。京师图书馆只在1909-1928年存在,所以它应该是那个时期抄自明代抄本的。贾敬颜称此本藏中国国家图书馆^①,但它作为20世纪抄本显然没有被收进国家图书馆善本书目。傅京本的《圣武亲征录》在复制傅本时有一些校正,根据的应该是何秋涛校本。第二种抄本,是涵芬楼藏万历抄本^②,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(索书号:7557),残存91卷,29册,有张元济(1867-1959)印、涵芬楼印(下文简称“张本”)。张本比傅本更接近原初本。

张宗祥没有给出任何校勘记,幸而有他的稿本为证。他在192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过程中形成的稿本《说郛》,现藏浙江省图书馆(索书号:7437,下文简称“涵稿本”)^③。涵稿本墨书部分为其底本傅京本,基本上与傅本相同,但有一些校改并统一异体字。朱笔是张宗祥据张本所加异文及所补阙文。这证明张宗祥用两种本子进行了合校。《圣武亲征录》的合校乍看不明显,因为傅京本与张本较为相近。

与王国维相比,张宗祥的兴趣不在蒙元史事,而是在于复原《说郛》古本。张宗祥不用何秋涛、王国维校本为底本,故而一举避免了从钱大昕抄本传承而来的诸抄本的众多舛讹。这对于《圣武亲征录》研究很重要。

伯希和与中日学界交流密切,他极为关注王国维的研究。王国维去世后不久,伯希和以王国维校注本为底本,主要校以那珂通世本和张宗祥本,完成了汉文校勘稿,并与韩百诗合作编制了索引。其稿现藏法兰西学院亚洲学院中央亚洲与高地亚洲研究中心(Centre de Recherches sur l'Asie Central et la Haute Asie, Instituts d'Asie, Collège de France, Paris)。罗依果获得复印件,整理发表了伯希和、韩百诗制作的索引^④。1931-1935年,韩百诗在伯希和指导下译成法语初稿。在此期间,伯希和在《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

①贾敬颜:《缀言》,《圣武亲征录(新校本)》,第9页。

②商务印书馆编:《涵芬楼烬馀书录》卷三,商务印书馆,1951年,叶五十七至六十三。

③浙江图书馆古籍部编:《浙江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》,浙江教育出版社,2002年,第670-680页。

④Igor de Rachewiltz, “On the Sheng-wu Ch'in-cheng lu,” *East Asian History* 28, 2004, pp. 38-39. Paul Pelliot and Louis Hambis, “Index of Mongol and Chinese Proper and Geographical Names in the Sheng-wu Ch'in-cheng lu,” *East Asian History* 28, 2004, pp. 45-52.

文集》中发表了一篇文章,讨论《圣武亲征录》中的一段记载^①。1938年以后,伯希和亲自修订法语译稿并作注。1951年,韩百诗将伯希和遗稿第一部分整理出版。韩百诗的序言中有一个严重的错误。伯希和在注释中屡次说王国维没有得到“Chouo fou³”抄本,指的是1927年张宗祥本,它比王国维本晚一年出版。韩百诗却误解了伯希和的意思,以为“Chouo fou³”抄本指的是傅本^②。这很荒谬,因为傅本是王国维校勘的重点。伯希和的校勘是在王国维基础上的局部推进。伯希和是兼通蒙古语、波斯语和汉语的大学者,其注释价值最高。但伯希和醉心于旁征博引,常常流于枝蔓。一条注动辄长达数页,严重破坏了正文的连贯性。但这其实与西北史地学的笺注形式一脉相承。

总之,民国藏书家、学者关注《说郛》本《圣武亲征录》,可谓得西北史地学之余荫。这种研究趋势,借由王国维的影响力,被西方汉学家所接受。

五、结论

《圣武亲征录》到清末以前一直以抄本形式流传,虽然清末开始出现刊本,但稿抄本仍是其书流传的重要形式。《圣武亲征录》在长期传抄中出现诸多舛讹,使校勘成为学者面临的首要任务。乾嘉以降,《圣武亲征录》的史料价值引起学者的注意,近代西北史地学者群体投入很多精力进行校注。从校勘层面而言,何秋涛所用诸抄本属于同一个系统,校勘成果有限。王国维、伯希和用《说郛》明抄本,是很大的进步。沈曾植、缪荃孙所用的缪本,属于另一独立的系统,但直到2020年贾敬颜新校本出版,才重新为学界所知。与缪本同属一个系统的郑本,也是贾敬颜重新发现的。这一系统还有第三种存世抄本,尚未被学者关注,现藏日本静嘉堂文库,为松江华亭人陆树声(1509-1605)旧藏(下文简称“陆本”)。陆本是目前所知明代仅有的一部单行本《圣武亲征录》。邵远平《元史类编》(1699年成书)是迄今所知第一部征引《圣武亲征录》的书,其所用本子就与陆本很接近。陆本抄写质量上佳,至今尚未被用于校勘。

截至近代,学者所见《圣武亲征录》诸本,按照流传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:(一)陆本、汪启淑进呈本、郑本、缪本;(二)两淮盐政进呈本、汪本、钱本、何秋涛本等;(三)《说郛》明抄本(史本、傅本、陶本等)。近代学者惟有沈曾植、缪荃孙1917年将三大类合校,可惜他们的研究失传,王国维也未能全面继承,只是合校两大类而已。直到贾敬颜广为搜罗,得诸本21种,才实现各

^①Paul Pelliot, “Sur un passage du *Cheng-wou ts' in-tcheng lou*,”《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》,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,1935年,第907-938页。

^②Paul Pelliot and Louis Hambis, *Histoire des Campagnes de Gengis Khan*, pp. xx, 473.

系统的全面合校。而且正如饶宗颐等揭示的,《说郛》明抄诸本流传系统很复杂^①,因此校勘工作必须进一步细化。

《圣武亲征录》在近代的传抄与校注研究,体现出西北史地学的几个特点。首先,西北史地学是乾嘉史学的延伸,尤其是受钱大昕影响很大。何秋涛校本传承自钱大昕抄本,长期主宰近代学者的阅读范围。第二,近代西北史地学借助交游圈传播。作为一个小群体,从徐松、张穆、何秋涛,到李文田、缪荃孙、沈曾植,再到王国维,都是通过交游而进行知识交流和传承。第三,晚清西北史地学知识传播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和片段性。著作少有刊布,多以稿抄本形式流传,难免散佚,学术信息通过交游口耳相传,都限制了知识传播的效率和系统性。进入民国后,西北史地学群体逐渐凋零,无以为继,王国维成为少有的继其学者。沈曾植合校三大类本子,超拔于时,可惜其学失传。王国维没能得到《知服斋丛书》刊本、沈曾植校本,导致底本不佳,也遗漏了一个重要的流传系统。这是近代书籍、知识流传和失传的一个侧影。

西北史地学积极引入域外史料,也促进了中国文献的外传。自洪钧开始,拉施特《史集》成为研究元史的必备文献,而国外学者也通过西北史地学者搜求《圣武亲征录》。何秋涛本被巴拉第俄译,为欧洲学者所知。日本内藤湖南、那珂通世关注西北史地学,将《圣武亲征录》引入日本。法国伯希和通过羽田亨、王国维获得最新研究动态。那珂通世、伯希和使用笺证、长注的体例,实际上都与西北史地学一脉相承。

【作者简介】马晓林,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。研究方向:元史、中外关系史。艾骞德(Christopher P. Atwood),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东亚系教授。研究方向:蒙古学、汉学。

①饶宗颐:《〈说郛〉新考——明嘉靖吴江沈瀚钞本〈说郛〉记略》,《饶宗颐史学论著选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3年,第661页。艾骞德(Christopher P. Atwood)著,马晓林译:《〈说郛〉版本史:〈圣武亲征录〉版本谱系研究的初步成果》,《国际汉学研究通讯》第9期,第397-438页。